

# 中国越南归国难侨的安置与生产生活现状探析

——以广东杨村华侨柑桔场为例——

邓仕超  
黄丽嫦

## 前 言

能够在西口清胜先生退休纪念专刊上发表拙文，笔者感到无比的荣幸。西口先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对东南亚以及华侨华人问题也有独到的研究。西口先生在中国学界享有很高声誉，这一点无须笔者赘述。令笔者感动的是，几十年来，西口先生对中日学术交流一直非常热心，多次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和作学术报告，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学界长者。至今，笔者就职的东南亚研究所还保存着20年前西口先生参加敝所30周年所庆时与前所长陈乔之教授等人的合照。每次看到照片上先生生气勃勃的样子，总禁不住产生一种感叹，并为敝所这么早就与先生之间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

除了学术交流，西口先生还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很多心血。据笔者所知，先生不仅招收和指导了很多中国留学生，而且先后被厦门大学以及敝校暨南大学聘为客座研究员，多次亲临中国大陆授课，使中国学生受益良多。西口先生态度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注重实地调查，这些都是笔者学习的榜样。

在这篇拙文中，笔者试图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并尽量利用广东杨村华侨柑桔场实地调查的资料，对有关越南归国难侨的安置以及其后的生产生活状况加以说明。

### 一、华侨农场与归国难侨的安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意识形态以及战争等原因，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受到限制，许多华侨华人甚至遭到迫害和驱赶，被迫逃难回到中国，或者逃亡到欧美以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大陆，将这些被迫回国的难民型归侨称为归国难侨，他们一般是在较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对中国社会造成较大压力，并对中国政府与侨居地当局的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先后接待和安置了五批归国难侨：第

一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因马来西亚殖民当局大肆迫害进步华侨而被迫回国的19,000余人,他们大多回原籍,无籍的则安置在华侨农场;第二批是由于朝鲜战争而从朝鲜回国的28,000余人,大多数安置在东北、山东、河北等地参加农业生产;第三批是1953年至1968年从日本归来的华侨,共6,500人,大多数被照顾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河北、浙江、江苏等省,根据各人的专长分配在厂矿、企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工作<sup>1)</sup>;第四批是1959年和1965年从印尼归来的13.6万余人<sup>2)</sup>;第五批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越南归来的27万余人<sup>3)</sup>。前三批由于规模相对较小,所以绝大多数是以分散安置的原则安排回原籍或各种行业部门工作,而第四批、第五批因为规模巨大,导致了中国政府对归国难侨的安置政策由分散安置向集中安置转变,华侨农场的数量和规模也因此有了长足的进展。

华侨农场是中国政府集中安置归国难侨生产、生活的场所。据中国侨网的统计,中国现有华侨农场84个,其中广东23个、广西22个、福建17个、云南13个、海南5个、江西3个、吉林1个<sup>4)</sup>。在这84个华侨农场中,其中有43个(占一半以上)是20世纪70年代末为安置越南归国难侨而设立或扩建的。越南归国难侨共约27万余人,其中华侨农场安置16万人,农垦、林场安置7万人,其余为社会分散安置<sup>5)</sup>。因此,可以说华侨农场是中国安置归国难侨的最主要方式,而这些农场的生存发展已经成为农场所在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华侨农场的建设过程中,中央和各有关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华侨农场的干部职工们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些农场甚至有过繁荣时期。但是,由于华侨农场管理体制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大多数华侨农场发展缓慢,经济效益比较差。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在全国国营华侨农场中,亏损的有62个,占总数的72%<sup>6)</sup>。归国难侨生活困难的状况,在国内外造成了各种不良的政治影响。

广东的华侨农场数量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总量的27%,分布在14个地级市,总人口29.5万人,占全国总数的49%,安置归侨难侨人数则占到全国的40%<sup>7)</sup>。

## 二、越南难侨问题的产生及其安置

中国人移居越南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移居越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就着手制定北讨匈奴、南征百越的战略。其后“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sup>8)</sup>”,首次将岭南(包括现在的两广大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置入中国版图。秦、汉、隋、唐移居越南的人持续不断,宋朝末年和明初移居者最多<sup>9)</sup>。历史记载,1274年,一批渡海抵越的宋人被安排在升龙(今河内)的“街纺”;1679年,明朝遗将陈上川率部3000余人(含眷属)流亡西贡(今胡志明市)开荒垦殖,成为早期规模最大的中国移民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法国殖民者为加紧掠夺越南资源,采取免税优待等多种手段吸引中国劳工,形成中国人移居越南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前后,越南华侨已达到150万人,福建街、关圣街、行帆街等均是当时河内华侨华人

聚居的街区。<sup>10)</sup>

越南南北统一前，南方和北方的华侨华人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他们又都有一些共性，即南北两方政府先后都推行了对华侨华人的强迫同化政策。在南越，吴庭艳政府认为华人掌握了南越的主要经济命脉，为了控制华人的经济活动，采取了各种手段打击华人的经济势力。1956年南越政府规定，凡在越出生的华侨，一律为越南籍；1957年，又宣布华侨的身份证被废止，禁止华侨与国内来往，限制华侨从事鱼肉、杂货、木材、碾米等11种行业，禁止用华语讲课、解散侨团、封闭侨校和侨报等，致使数万华侨离开南越。<sup>11)</sup>在此期间，北越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始好而后差：初期，胡志明政府把华侨当兄弟看待，对华侨给予了特别照顾，华侨受到尊敬和爱护；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文革”，中苏关系恶化，北越政府也开始推行一些较为严厉的政治和行政措施，包括强迫华侨入籍等。

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政府于1976年要求华侨仍按南越政权时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对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如在一些华侨学校强制推行越语，限制中文授课时间等。

1977年，越南当局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的方针，把华侨华人成批赶回中国境内。1978年3月，又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对华侨小商贩乃至华侨工人家庭进行掠夺和迫害。同年4月，越共四届四中全会宣称中国是“最直接和危险的敌人”，许多华侨华人被逼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大量难民逃亡越南。<sup>12)</sup>

随着越南反华排华运动越来越严重，成千上万的难侨被驱赶，中国政府不得不通知越方，准备派船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和海防市，接回滞留在越南当地生活已陷入绝境和老弱病残的贫苦华侨难民。“1978年6月12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方，授权中国大使馆就中国派船接侨问题同越方进行商谈。”<sup>13)</sup>其后虽经过多次谈判，但越南方面却故意拖延刁难，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和条件。“从1978年6月13日至7月27日，中国驻越大使馆同越南外交部共举行了19次会议，由于越南方面根本不承认在越南有大量华侨，更不承认有中国难侨，在接侨问题上毫无进展。中国派往越南海防港和胡志明港的两艘接运难侨的船只，一直被迫滞留越南港外海面上，接侨工作不能进行。与此同时，越南方面仍然继续对华侨实行迫害和大批驱赶，使被赶回中国的难侨急剧增加。”<sup>14)</sup>同年8月8日，中国政府又派出以仲曦东为团长的代表团，主动同越南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进行外交部副部长级会谈，但也<sup>15)</sup>没有取得成果。

不能前往越南接侨，那就只能在难民入境的地方接待。由于广西与越南相连，因此大部分越南难民是从广西的口岸、溢口和村弄便道入境的。根据难民的入境情况，中国政府在各个地方都设立了难民接待站。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各个接待站都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民兵、炊事员、医务人员、司机等。有的口岸由于难民比较多，给边境在粮食、医疗卫生、交通运输、住房、日用品等供应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工作人员也明显不足。为了解决当时的接待问题，中国中央和有关地方政府进行了全民动员来开展接待归国难侨工作，动用了一切资源为归国难侨免费提供饮食、住宿、医疗等方面的条件。遇到人力物力不足，

就立即从其他省市调运过来。同时，中国领导人还经常到现场接待、慰问、关心越南归国难侨，宣传中国接待安置难民的政策，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难民的关怀和同情，使归国难侨思想能够尽快安定下来。为了减轻各难民入境地区的压力，尽快疏散难民，必须加快难民的转运。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各部门在当时的配合也是比较好的。“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省（区），49个县市151个安置单位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加上湛江、南宁、玉林、百色、柳州、钦州等六个汽车总站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派出部队都对转运工作进行了支援<sup>16)</sup>。”

### 三、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的越南归国难侨安置与发展状况

广东省接待越南归国难侨的工作与国家政策是完全一致的。1978年以后，被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境内的归国难侨有27万多人，有10.7万人安置在广东省，其中安置到广东省各华侨农场的有8万多人<sup>17)</sup>。华侨农场是安置越南归国难侨的重要基地，而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就是这样一个基地。

#### 1. 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概况

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杨村镇，始建于1951年。据《博罗年鉴（2001-2002年）》统计，全场总人口32,752人（其中越南归国难侨7,175人），职工6,634人，场部下属有12个分场、13家工厂、11个公司、3所中学、11所小学、1家医院和1个柑桔研究所。该农场总面积89平方公里，已开发利用土地面积8,428.33公顷，其中耕地面积5,526.67公顷，林地面积2,435公顷，水面面积466.67公顷。大部分土地属红壤缓坡丘陵地，气候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2001年底，全场社会总产值15,575万元，其中：农业产值7,145万元；工业产值5,550万元；第三产业产值2,880万元。全场劳动力人均年收入4,168元，总人口人均年收入1,959元<sup>18)</sup>。

#### 2. 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归国难侨安置工作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以下简称为“柑桔场”）曾先后接待安置了大批孤儿、转业军人、上山下乡知青等，在生活安置、工作就业方面有一定的经验。1978年这个农场成为广东省安置越南归国难侨最多的农场之一。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间共安置了7,000多名越南归国难侨。通过查阅该农场内部资料和对农场管理者的访谈，我们了解到该农场在安置越南归国难侨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七件工作：

(1) 热情欢迎，妥善安置，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越南归国难侨的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要。饱受战乱和迫害的越南归国难侨，回国时绝大多数都拖儿带女，身无分文，处境非常困难。为此，国家当时拨出了专门的安置费，柑桔场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了归国难侨住房和各种生活设施，使归国难侨一到农场就有房住。同时，给他们分发衣物、

被褥以及其它生活用具。柑桔场领导亲自把生活补助费用送到各家各户，使他们能够尽快安定下来。生活补助费前三个月平均每人每月八块钱，三个月后平均每人每月六块钱。

(2) 组织越南归国难侨参加开荒种柑桔，自食其力，建设家园。按照当时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7,000多名越南归国难侨到柑桔场后，被安排到12个分场，82个生产队。符合劳动年龄的归国难侨从事柑桔种植，成为农场的职工。柑桔研究所也经常派技术员下队组织归国难侨职工学习柑桔种植技术，老职工也随时给予他们生产上的技术指导，使他们很快地掌握柑桔种植新技术，投入生产劳动。

(3) 重视越南归国难侨子弟的教育工作，使之人才辈出。1978年以前，该农场已办有幼儿园2所，小学13所，中学3所，因此越南归国难侨子弟一到农场都能就近入园入学，接受正规教育。想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侨生则可以经过华侨学校补习后参加高考，同时可以享受降分录取的优待，继续上大学。另外，每学期由农场拨款，给予适当的补助，帮助越南归国难侨解决入学费用，减轻负担。

(4) 政策上给予关怀，在越南归国难侨中培养出一批人才。越南归国难侨中有的以前在越南当过干部、教师或从事技术性工作，安置初期由于农场条件比较差，只好一律分配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后来，按专业和能力调整他们的工作，首批安排在干部、教师、技术岗位的有28人。同时在工作中注意教育、培养，使他们不断成长，成为建设农场和国家的重要人才。

(5) 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使越南归国难侨更加安居乐业。最先，运用国家拨下来的安置费，筹建安置房，作为暂时安置，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另外还有仓库、厨房、饭堂等公共设施。后来按照“国家拨一点，农场给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形式，逐年建了不少侨房，使人均住房面积由最初的7平方米提高到后来的11平方米。

(6) 对困难户给予特别关照。国家每年拨出一定的归国难侨事业费，用于对一些归国难侨生活困难户的固定补助以及在入学入托、医疗、殡葬、修理房舍、年节慰问等方面的临时困难补助。

(7) 设立侨务科、侨联会，加强侨务工作。柑桔场在1981年设立了侨务科，1982年7月成立侨联，下设委员15人，主席、副主席各1人。各分场均设立侨联小组，共有成员79人，形成全场侨联工作网络，在归国难侨中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 3. 广东杨村柑桔场的发展变迁

越南归国难侨安置下来以后，柑桔场的发展便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回顾柑桔场安置越南归国难侨后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将之大致分为初建、改革与探索三个阶段（需要提到的是，柑桔场的职工一般把柑桔场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还在延续，而笔者把2003年至今称之为转型探索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84年，属于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客观地讲，柑桔场条件比较差，环境也比较艰苦。当然这是相对于现在而言的，因为当

时农场要比当地的农民生活水平高一点，农场有国家的补贴，当地人都很羡慕农场职工。该农场地属小丘陵，荒地多，只适合种树，交通也不方便，越南归国难侨在越南时有的是小商贩，有的只会种水稻，不懂如何种植柑桔。柑桔场根据越南归国难侨的特长，逐渐培养他们的农业劳动能力，并从中培养干部，年纪大的就从事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政府的帮助下，越南归国难侨用自己的双手垦荒种柑桔及其它农作物，很快农场衣食住行基本能够自给自足，还创办了农副产品加工厂。农业、工业在管理上推行按工付酬，职工每天按时工作，每个劳动力每月约40元工资。按当时的物价衡量，每月40元刚刚够买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按照“一个劳动力养活一个非劳动力”的原则，一个非劳动力每月有14元补贴，但由于当时国家贫困，制定的政策落实不了，出现很多拖欠农场职工工资的情况，在2003年改制之后才把以前的拖欠工资和补助补回来，该农场共补回了2500多万<sup>19)</sup>。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柑桔场的发展比较缓慢。

柑桔场自安置越南归国难侨后，即建立起一个与周边地区存在一定差异的特殊社区。越南归国难侨继续延续着他们在越南时的风俗习惯，比如他们戴的帽子仍然是尖顶竹帽，而周围地区当地人戴的是圆顶草帽，所以一看到戴尖顶竹帽的就能辨认出是越南归国难侨。他们在农场内也经常用越语交流，比较喜欢戴金首饰，还会做很多越南小吃和特产。而随着与当地人的不断融合，他们原本的风俗习惯有一些渐渐被同化了。

第二阶段从1985年至2002年，这一阶段柑桔场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固定工资不利于调动越南归国难侨职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各项经营举步维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针对华侨农场落后的经济水平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制定了家庭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26号），要求各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走农村改革的道路，认真实行和努力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农场的管理职能，从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生产为主，向承包的各个家庭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通过生产服务，进行计划指导<sup>20)</sup>。在中央政策指导下，柑桔场也实行联产计酬家庭承包责任制，每个柑农承包360株果树，定产量、定质量、定成本，超产奖励，欠产全赔；随后进一步完善各种经济包干责任制，贯彻“以柑为主，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柑桔场农业生产基本建立起岗位承包模式的“家庭农场”，极大地调动了越南归国难侨承包户的积极性。同时农场逐渐完善双层管理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积极打造农产品品牌，“杨村柑桔”品牌在国内甚至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柑桔场在生产与经营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1）农业方面。2001-2002年，柑桔场实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除了种植柑桔外，还种植了部分其他水果，如龙眼、荔枝、芒果等，也种植了粮食作物等，使农场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据《博罗年鉴（2001-2002年）》统计，2001年底柑桔场农业产值达到7,145万元，同年各种农业作物数据如下表：

表1 2001年柑桔场各种农业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

农业产业种类	具体作物	种植面积（公顷）	产量（吨）
水果	全场种植水果总计	676.13	7,341.7
	柑桔	447.67	7,330
	龙眼	178	0.7
	荔枝	45.13	1
	芒果	0.67	1
	菠萝	2	6
	其他杂果	2.67	3
粮食	全场种植粮食作物总计	1,263.87	6,204
	水稻	948.53	5,171
	旱粮	80.67	175
	薯类	234.67	858
经济作物	全场种植经济作物总计	1,058.4	34,232
	大豆	156.87	211
	甘蔗	404.67	32,683
	油料作物	485.67	1,093
	木薯	11.8	245
其他作物	全场种植其他作物总计	437.33	5,016
	蔬菜	316.2	3,831
	瓜类	73.2	754
	青饲料	48.33	431
渔业养殖	全场渔业养殖总计	79.4	420

数据来源：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博罗年鉴（2001-2002年）》，广东深圳美嘉印刷有限公司，2003年，第400-401页。

2001年，在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专家组的支持帮助下，柑桔场还创建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在该年底挂牌运作。该园区是一个高起点、高水平、多功能的高新技术综合园区，园区功能区布局为：果林区、蔬菜区、花卉区、畜牧区、生物技术区、绿色食品加工区、综合实验区和会展中心。

(2) 工业方面。2000年柑桔场全场工业总产值达5,539万元, 比上年增长316万元, 增长6%。其中集体企业产值3,849万元, 占工业总产值的69.5%; “三资”企业产值380万元, 占工业总产值的6.9%; 私营企业产值1,310万元, 占工业总产值的23.6%。2001年全场工业总产值5,550万元, 比上年增长11万元。其中集体企业产值3,328万元, 占工业总产值的60%; “三资”企业产值265元, 占工业总产值的5%; 私营企业产值1,957万元, 占工业总产值的35%。

(3) 第三产业方面。2001年底, 全场第三产业产值2,880万元, 比上年增长52万元。集体企业和私营服务业40家, 工商个体户365家。

(4) 招商引资方面。柑桔场制订了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举办园区招商会, 引进项目资金, 2000年引进外资4家, 引进资金400多万元。2001年引进开发项目11个, 引进资金近5,000万元。其中引进农业开发项目6个, 引进资金4,000万元; 引进工业项目5个, 引进资金1,000<sup>21)</sup>万元。

除此之外, 这一阶段柑桔场在医疗卫生、科技普及应用、教育事业、计划生育、畜牧业、林业等其他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 是柑桔场新的转型探索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针对华侨农场经济发展仍然滞后的现实, 对华侨农场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探索, 其主要趋势是将华侨农场从独立于本地社会之外, 向融入本地社会转化<sup>22)</sup>。1995年12月4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提出《关于深化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将领导体制改革作为华侨农场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2) 华侨农场交由所在地政府领导后, 要将现在由农场管理的教育、卫生、政法等方面的社会性事务, 交给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管理。

(3) 鉴于华侨农场的特殊情况和当地的实际困难, 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同意在今后若干年内, 在基本建设投资、华侨事业费及农业贷款等方面, 继续给予华侨农场必要的扶持。建议地方政府同时<sup>23)</sup>在各方面对华侨农场增加资金扶持。

1995年, 柑桔场挂上“惠州市杨村经济管理区”的牌子, 同时保留原来的“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的牌子, 实行两个牌子, 一套班子。2003年之后又把柑桔场纳入当地杨村镇, 柑桔场与杨村镇合并后, 杨村镇更名为“杨桥镇”。这些体制上的改革给柑桔场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杨村镇的主要道路基本上换成了水泥公路(约4公里)。农场的子女接受9年义务教育, 学费全免, 归国难侨子女小学每学期补助30元, 初中补助50元。在住房方面, 越南归国难侨在2008年底之前陆续搬进新居。而且, 现在柑桔场内的人只要符合社保规定的条件, 每年自己承担1,800元的费用, 在达到退休年龄后都可以领取社保退休金。在医疗方面, 柑桔场也会经常请医疗小组进村为人们提供免费检查<sup>24)</sup>。



#### 四、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及越南归国难侨面临的现实问题

虽然目前柑桔场的越南归国难侨的生产生活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经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我们了解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1) 柑桔的恶魔——黄龙病对柑桔场生产的影响。以前杨村华侨柑桔场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柑桔生产专业基地，也是亚洲面积最大的柑桔园，近几年来柑桔场遭遇黄龙病的侵袭，而防治黄龙病的技术还不成熟，造成柑桔种植风险大大提升。我们从调查得知，目前只有少量的果农继续种植柑桔，大部分人都已经转种其他农作物或外出打工。

(2) 农民的自身资金少，无法投资扩大再生产。据柑桔场风门分场洗副场长介绍，现在农场内的农民种植果树或做生意全都是靠自身多年辛苦积蓄和向亲戚朋友借债，七凑八凑才凑了几万元，扩大再生产规模有限。如果遇上自然灾害，农民只能独自承担风险。而近几年当地也确实时时遇上各种自然灾害，因此许多农民种植亏损严重，只好放弃种植。笔者到柑桔场做调查时，发现很多土地因闲置而长满野草。

(3) 柑桔场内很多人仍然无法适应改制后的角色。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我们了解到柑桔场很多人仍然习惯1985年以前月月有工资领的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人不知如何去搞生产。而且柑桔场职工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中年的只能靠出卖体力劳动，或打一些散工，或仍按最原始的方法种植农作物，每个月只有500-1,000元的收入。

有的柑桔场职工担心体制经常变来变去，利益受损。1995年，柑桔场实行两个牌子，一套班子。这种模式叫区场合一、强化管理职能模式。2003年之后柑桔场又被纳入当地杨村镇，合并改名为“杨侨镇”。这种模式叫改场建镇，场镇合一模式。这两次的改革调整，把柑桔场推向了市场，它原先享有的政策优势虽正在逐渐丧失或者说弱化，但是，长期以来柑桔场形成的对国家优惠政策的依赖性却很难一步消除，这使得它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步伐非常缓慢，部分归国难侨甚至出现了一种“集体失落”<sup>25)</sup>感。

2003年改制时，杨桔场大多数职工对场镇合一模式持反对态度，有的甚至到惠州市政府门前示威。为什么柑桔场不愿意合并到地方政府呢？经过认真了解才明白，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怕合并到当地乡镇之后，国家就不会象以前那样重视农场，以后就不再拨资金给他们了，或者拨的资金要和当地人一起分配，而真正分到他们身上的就少了。

(4) 柑桔场越南归国难侨的地域认同与地方融入问题依然存在。柑桔场有一部分越南归国难侨很少与当地人交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守着原有的文化风俗和语言，心理上归属于越南归国难侨群体。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农场经济发展比当地地区发展要好一些，所以他们心理上往往带有某种特殊感和优越感。当地人虽然与他们生活得很近，但也可能由于“心理边界”<sup>26)</sup>的原因，很少主动去与他们交往，所以对柑桔场职工也不太了解。随着农场改制，现在的越南归国难侨子女们，大多说本地话，也有一部分越南归国难侨为了孩子上学比较方便，与当地孩子同校学习，彼此似乎都“玩到一起了”。

但是, 大多数华侨子女还是在柑桔场学校读书。高考时华侨子女可以得到“加分”的优惠政策, 虽然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类似这样的政策在越南归国难侨与当地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边界”, 由此多少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隔膜。

(5) 柑桔场改革仍然不够开放, 存在一定的地方封锁, 地方官员不是民选出来的。目前, 中国农村基本上都实现了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干部的做法。但是, 据柑桔场的职工介绍, 杨柑场的地方官员不是由他们职工直接选举产生的, 而是由上级任命的, 而且这些被任命的地方官员是终身制的。因此, 绝大多数农场职工希望杨柑场能够像农村村委会一样实行普选, 由职工选举出得民心、有才干的人来胜任, 带领全场职工走向更好的生活。

(6) 柑桔场部分越南归侨职工的生活困境。在柑桔场, 越南归国难侨及其子女大致可以分为50岁以上、30-50岁、30岁以下三个年龄层次。在生活方面, 上下两个年龄层相对容易, 而中间年龄层却比较困难。这似乎不符合常识, 但却是中国越南归国难侨的现实情况。柑桔场越南归国难侨中, 现在50岁以上的人, 他们当时被赶回中国时正值青壮年, 是柑桔场的主要劳动力, 在农场辛辛苦苦劳动几十年, 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取800多元的退休金, 在生活方面还算过得去。30岁以下的人, 是越南归国难侨的子女, 他们出生成长在中国, 所受教育与当地孩子没有大的差别, 还享受教育补助和高考加分一类的政策优惠, 未来的发展没有太大的障碍。而现在30-50岁之间的人, 他们刚回到中国时还是儿童、少年, 回国后由于条件差, 适应时间长, 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文化程度比较低, 主要靠打工和种植农作物取得微薄收入。近几年农场改制后, 他们大多数没有经营能力, 也很难获得可供经营的土地, 又失去了原有的国家的补贴, 只能靠出卖自己廉价的体力来养家糊口, 大部分人生活比较艰苦。尽管国家规定, 柑桔场职工可以参加社保, 但每人每年1800元的社保费, 令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尤其是30-50岁的人收入不高, 要交这笔费用到退休实属不易。

## 五、从杨村华侨柑桔场的现实看21世纪中国华侨农场的对策与出路

柑桔场的发展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目前, 全国华侨农场都面临管理体制改革、处理与地方关系、归国难侨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问题, 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华侨农场自身应当采取哪些对策呢? 在此, 笔者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 华侨农场以及广大职工应当更新观念, 努力培养市场意识。华侨农场过去多数靠政策性补贴维持, 因此, 部分华侨农场和职工有着较严重的等、靠、要的思想, 或是依赖政府救济, 或是等待海外亲友的馈赠。因此华侨农场以及广大职工应该彻底改变过去因国家对华侨农场包揽过多而产生的依赖思想, 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培养竞争意识, 学会自力更生, 积极为自己谋出路。

第二, 坚持因地制宜, 在改革过程中理顺华侨农场与所在地的关系。每一个华侨农场的建立和发展既与国家政策分不开, 也与华侨农场所在地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等因素

密切相关。由于国家的华侨农场政策，过去华侨农场的发展呈现大致相似的历程，但由于华侨农场所在地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因而各个华侨农场的管理体制以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别。现阶段华侨农场的改革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改革模式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之分，其关键要看采用的模式能否有效地促进华侨农场以及所在地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各地华侨农场在逐步转化为属地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同时要打破地方封锁，推行地方干部直接选举制度，在华侨农场中挑选合适的人才出任地方官员。在此基础上，逐步理顺华侨农场与地方的关系，使华侨农场真正融入地方社会。

第三，进一步加强华侨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在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华侨农场要借助地方的力量，逐步改善内部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开放网络，为其向新型社区和新型产业区方向发展和招商引资创造条件。

第四，华侨农场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融入所在地经济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华侨农场与一般农村相比，存在三大优势，即“侨”的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这些对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招商引资都非常有利。

(1) “侨”的优势。华侨农场职工海外关系众多，比如柑桔场越南归国难侨的亲朋好友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加拿大，有的在香港，有的在越南，而且，越南归国难侨一般能懂好几种语言（包括粤语、客家话、越语等），他们可以向国外的亲朋好友宣传柑桔场，充当柑桔场产品对外贸易的中介，同时鼓励和介绍他们的亲朋好友到华侨农场进行投资开发。广东、广西华侨农场占全国华侨农场总数的一半以上，要努力抓住机遇，搭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泛珠三角”等经济快车。

(2) 资源优势。华侨农场都具有较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比如，目前柑桔场处于转型期，很多农户种植农作物亏损，因此很大一部分土地撂荒，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而且，大部分华侨农场剩余劳动力较多，华侨农场所在地也存在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些能够为华侨农场投资办厂和发展第三产业提供稳定的劳动力资源。

(3) 政策优势。为了促进华侨农场的改革和发展，中央和地方规定华侨农场在投资和开发方面享有一定的政策优惠。

第五，完善华侨农场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快速发展。华侨农场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虽然跟不上城市职工，但还是走在农村前面。在新的形势下，华侨农场要与所在地协调，同时有效利用国家有关政策优惠，建立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侨居造福工程、抚恤救济、教育等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归国难侨及其子女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 注

1) 梁姣：《建国后中国政府安置归难侨工作研究——以广西国营华侨农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4月。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侨务工作》，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站：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4859&secid=4887>

- 3) 张兴汉、陈新东、黄卓才：《华侨华人大观》，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 4) 《中国华侨农场简介》，中国侨网：<http://www.hsm.com.cn/news/2005/0920/68/314.shtml>。
- 5) 同上。
-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侨网：<http://www.hsm.com.cn/node2/node116/node446/node1122/userobject6ai57752.html>。
- 7) 《华侨农场》，《南风窗》2007年第10期。
- 8)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62页。
- 9) 张兴汉、刘汉标编著《世界华侨华人概况》(亚洲、大洋洲、非洲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 10)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 11) 同上。
- 12) 刘笑盈、于向东：《战后越南华人四十年历史之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 13)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4页。
- 14) 同上，第497页。
- 15) 黄小坚：《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第55页。
-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防城港市委员会：《防城港文史资料》(第一辑综合本)，1994年，第196页。
- 17)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247页。
- 18) 博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博罗年鉴(2001-2002年)》，深圳美嘉印刷有限公司，2003年，第400页。
- 19) 笔者2008年4月对杨村华侨柑桔场风门分场周场长(越南归国难侨)的访谈。
- 20) 梁辉荣：《对华侨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思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  
<http://www.gqb.gov.cn/news/2006/0531/1/2517.shtml>。
- 21) 第(1)至(4)点的数据均引自《博罗年鉴(2001-2002年)》，深圳美嘉印刷有限公司，2003年，第401页。
- 22) 梁姣：《建国后中国政府安置归难侨工作研究——以广西国营华侨农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
- 23)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深化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http://202.116.13.21:8088/file/file.ashx?fileResourceID=laws&fileID=XZFG/400434/g400006991.htm&charset=gb2312&path=XZFG%2f400434%2fg400006991.htm>
- 24) 以上数据是笔者2008年4月对柑桔场风门办事处洗副场长(越南难侨,当地官员)和分队队长周队长(越南难侨,当地官员)等的访谈整理而来。
- 25) 参见刘朝晖《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 26) “心理边界”指一群人自觉不自觉地固守某种语言、共享利益、文化习俗、信仰以及对“原住地”经历的集体记忆等。而在其外部也存在着一个无形的边界,那就是建构在“他群”心里的“族群边界”,也就是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他群”的心目中,始终存在着“非我族类”的“心理边界”。参见刘朝晖《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